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现实逻辑、理论框架与实践进路

韩永辉 李思怡 成 昊

摘 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思潮再度涌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更为突出。为发挥多边力量、应对外部风险，本文首先厘清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间的内涵联系，进而分析二者间存在的互促发展机制、构筑二者间双向赋能的理论框架，并基于此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4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三班、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地，教授；李思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科研助理；成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E-mail: anroycheng@163.com。

一、引言

目前，全球格局正处于复杂动荡的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未达预期；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使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思潮再度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1&ZD0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71873041;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2B151502000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度特别委托项目(项目批准号GD22TWCXGC12)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现，全球各国外源风险水平不断提高，显著影响多边合作机制的深化发展。基于中国视角，外部环境动荡已成为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市场资源错配、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亦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质量发展进程。^①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共建“一带一路”历经十年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共建国家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占比较高，整体经济、技术和基建水平相对落后，^②产业数字化发展基础亦较为薄弱，^③仍面临较为严重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

面对全球动荡变革时局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等关键时点的历史性交汇，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新质生产力概念既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妥善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风险、紧抓国际格局演变重构所携机遇的关键思想引领。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来看，其“新”所代表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和“质”所代表的创新驱动本质，^④不仅将更好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还可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向外产生更大正向外溢。为此，本文在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及特征的理论基础上，厘清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间的互促机理，探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协同并进的现实路径，为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步伐提供研究助力。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其内在属性呈现出鲜明的人民

① 贺颖、倪红福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对策建议》，载《财经智库》2023年第8期，第47-70、145-146页。

② 屠年松、郑雅哲等：《“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载《经济问题》2024年第5期，第52-60页。

③ 李青、易爱娜等：《“一带一路”数字合作：成就、挑战与展望》，载《战略决策研究》2023年第6期，第51-67页。

④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载《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3页。

性、协调性与开放性特征。^①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发展根本目标的论述高度契合，即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最终将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显著提升。而“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将推动各国社会全面进步、助力沿线各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作为重要目标。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型发展日益完善和多边合作的持续深化，中国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与变革性突破，必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向共建国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一）以前沿技术突破赋能“一带一路”科技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源于颠覆性、根本性技术突破，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其对既有技术路径和范式的创新性重塑更为显著。在新质生产力引领下，一系列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将推动产品架构、商业模式乃至应用场景的加速变革，^②由此形成强大内生动力将带动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跃升，进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目前，中国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难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单边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华实施的技术封锁与科技制裁，已成为阻碍中国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技术变革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将伴随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诸多关键核心技术的接续突破以及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宏观格局，最终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持续攀升。

基于“一带一路”视角，中国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所取得的技术突破和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成效，可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在共建国家中产生大规模的正向外溢效应。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外技术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2023年11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上，中国携手各共建国家一同提出了《国际科技合作倡议》，该倡议旨在倡导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坚持“科学无国界、惠及全人类”，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要“携手

^① 张森、温军：《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一个分析框架》，载《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5期，第1-12页。

^② 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15-17页。

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①同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科技合作协定不断增加。至2023年底，中国已和超过8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结合中国与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的合作协定及发展规划、谅解备忘录来看，深化技术合作、搭建中外双边技术合作框架和机制，已成为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共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外双边技术合作共研渠道已较为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突破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可通过这一渠道实现良好正向外溢。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技术密集度逐步提高。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近几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中的技术要素引领作用更为突出，部分基于中国具备领先优势技术所开展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已取得良好成效。截至2023年末，中国已与各共建国家以合作形式建设了“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50多家、跨国技术转移中心9个，累计举办技术交流对接活动300余场，促进千余项合作项目落地。

目前，中国已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的多个沿线国家开展了众多技术共享和投资合作项目，合作成效已得到全球认可。如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采矿业及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共享合作，已带动印尼由粗镍矿出口大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精炼镍生产国；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光伏、风电技术合作亦得到阿拉伯国家广泛认同，合作范围由能源领域不断向5G通信、人工智能领域拓展，并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对华投资规模的迅速上升。可以预期，中国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将发挥出更大的对外溢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共享、项目共建等形式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最终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逐步脱离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实现科技化发展。

（二）以数字经济合作赋能“一带一路”数字化发展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特征。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其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突出表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据要素作为重要的创新要素之一，其对市场主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已得

^①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4071.htm.

到验证。^① 中国政府亦高度强调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在发展中的作用，相继出台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政策措施。可见，对新质生产力的大力培育，实则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化与延申，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数字技术革新、数据要素整合、数字经济培育等数字化举措都将成为关键抓手。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也在迅速提高，对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需求不断扩大。在2023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字经济高级别论坛上，智利、阿根廷、肯尼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出席并致辞，代表各共建国家表达了深化数字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并一致推动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航运贸易数字化与“一带一路”合作创新白皮书》等协议达成。可见，中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带动本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变革性突破的同时，也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赋能共建国家数字化发展进程。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力量，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不仅可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协同增长，还将增强区域内商品与服务的流通性。^② 同时，由数字技术突破带来的实时数据分析和信息交换系统的建立，亦有助于共建国家更好对接彼此市场、应对国际经济变化，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水平。这种数字化发展不仅可加速各成员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也将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沿线国家数字化转型和经济现代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的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将直接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化水平提高。推动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的共建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策略。中国新质生产力促进的数字技术进步，将提升“一带一路”数字基建合作项目的技术密集度，

^① 赵宸宇、王文春等：《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载《财贸经济》2021年第7期，第114-129页。

^② 包振山、韩剑等：《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载《国际经贸探索》2023年第2期，第4-20页。

进而增强共建国家网络连接稳定性和数据处理效率，更有力地支撑区域内的数字经济活动。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和互联互通，也将有效助推共建国家数字化转型进程，为“一带一路”数字化、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以国际分工优化赋能“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

基于产业视角，新质生产力是企业采用新型要素组合方式、提供新产品以更好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在“企业集合”意义上形成新业态和新结构，^①具体表现为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变。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将带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助力中国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全球先机，同时也将倒逼相对落后产业的对外转移。

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产业水平较低、国际分工参与不足，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大收益。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产能转移加速，将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助力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全球化发展。一是，新质生产力可促进中国生产智造水平提升，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更多优质生产工具。中国在采矿及冶炼、农机等领域内的技术水平提升将为共建国家提供更为高效可靠的生产工具，提升其生产制造效率、缩减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长，进而推动其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扩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最终带动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倒逼中国部分产业产能向外转移，提升相对落后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为更好拓展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空间、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中国政府已于2022年出台《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部分偏向低端的制造业产能亦因成本上涨等因素存在向外转移意愿。而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仍未形成成熟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条，甚至有部分国家因战乱导致产业体系严重受损，中国向外转移的部分制造业产能恰好可丰富这些国家的产业链环节，并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三是，

^①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6期，第127-145页。

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国终端消费品生产效率，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目前，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产能力相对薄弱，在粮食、医疗器械、电子产品等需求刚性高、规模大的产品生产中的效率较低，且由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加剧，部分国家甚至因物资短缺出现大规模社会问题，政府由此受迫向相关供应链投入大量资金以提升关键物品供给水平。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恰可以协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此类问题。中国可依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门类齐全的良好基础条件，针对性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其急需物品，以降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压力；同时，亦可缓解共建国家政府财政压力，避免政府因物资极端紧缺而采取短视投资、大量进口等行为，并带动共建国家资本合理配置至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中，推动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提质增效，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更大优势，反哺国内经济发展。

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反馈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其发展受到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储备质量、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等诸多内在因素的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在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引入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等，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范式的转变，^①由此，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将对核心技术、高端人才、关键原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要素提出更大的需求。然而，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国外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和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有效需求不足、不可再生资源受限、核心城市空间不足等问题亦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带来一定阻碍。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和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应对新质生产力培育所面临的挑战，需充分用好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时代机遇，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的交流合作，依托多边合作带来的外源助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生成。

^① 柳学信、曹成梓等：《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45-155页。

（一）以资源供给稳定助力产业链条韧性提升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紧密相关，^① 前沿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内的全球竞争优势。目前，全球各国在前沿产业、关键技术上的竞争日益加剧，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阵地，中国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中将面临更多制裁和打压。

当前中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链条中，仍有部分关键原料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仍然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恰可通过其稳定的政策沟通渠道及共建国家种类丰富、总量巨大的资源储备应对这一问题。以中国具备全球领先地位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其制作电池正负极所需的关键材料镍和铜的进口依存度均偏高且暂无可行替代原料，一旦出现镍、铜矿进口受阻情况，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将遭受严重冲击甚至生产停滞。同时，海外市场镍矿供应量及价格的波动风险较为显著。2020年，全球镍矿出口第一大国印度尼西亚曾以降低经济对镍矿出口依赖度为由，出台镍矿出口限制措施，导致全球镍价大幅上涨，伦敦有色金属交易所（LME）镍价一度10万美元/吨以上；2024年3月，因印度尼西亚矿产和煤炭开采业务活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报告（RKAB）整体发放进度缓慢，市场产生镍矿供应不足的担忧情绪，再度引发镍价在单月内上涨逾12%；加之2024年4月13日英美两国再度对俄施加制裁，迫使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和伦敦有色金属交易所（LME）禁止接受俄罗斯镍矿，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镍矿供应量及价格波动风险。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纵深推进，中国与共建国家政策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双方通过高层互访、发表联合声明、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这种密切的政策对话不仅大大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也进一步夯实了共同发展的行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以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为基础，中国与共建国家携手推动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多元化的合作格局，这不仅有力促进了关键资源要素在区域内部实现更加优化配置，也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不乏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储量和种类均十分丰

^① 庞瑞芝：《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形态及培育》，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18-21页。

富，且与中国存在较强的互补性。^①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两国的镍矿储备量及出口量分列全球第一、第二位；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铀、锑、钼金属储量；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中东国家则是传统油气出口大国。同时，上述资源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均有着重要支撑作用，镍、锑、钼分别在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产业中充当关键原材料，铀、石油及天然气等资源则可通过核电、清洁能源等形式，以绿色可持续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供能。伴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及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外溢作用发挥，“一带一路”国家一方面将强化自身对华的政策沟通及贸易畅通水平，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关键原材料的供给稳定性；另一方面将促进自身资源及矿产精加工水平，带动关键原材料产品供给的质量上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助力。

（二）以产业要素互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与新要素紧密结合的生产力新形态，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②由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的新型工业化亦能催生新质生产力。^③然而，当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一定阻力。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型城市的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已趋向饱和，且由于部分产业深度嵌入国际分工链条，对海运运力和物流时效的需求刚性较大，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梯度转移的意愿较弱，导致部分城市用于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工资水平上涨导致由人口红利带来的成本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制造业整体盈利能力遭到一定削弱，导致部分企业受迫降低研发投入、放缓自主创新发展步伐。上述两方面问题在阻碍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将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结合上述问题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所具备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和广阔发展空间恰可与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需求形成互

^① 于宏源：《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风险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5期，第51-62页。

^② 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3-12页。

^③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与互动路径》，载《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90-102页。

补，中国可充分利用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产生的互惠效应，^①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愈发凸显。在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下，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已有逐步成为新“世界工厂”的趋势，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加工制造业规模亦逐渐扩大。其次，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结构仍偏向低端，具有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空间和意愿。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国内土地、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要素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其既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充足空间，又具有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吸收技术外溢的需求。最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制造水平提升可更好满足中国企业上游加工需求。随着近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国际分工的融入程度提升，部分国家已积累了充足的制造业劳动力、专业化厂房等资源，整体加工制造水平有所提升。这一方面使得“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可为中国企业上游生产带来更廉价、更高质的供给选择，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承载能力，为中国更多相对偏向低端的产业环节提供了转移空间。

（三）以一体化大市场推动供给侧改革优化

从结构承载角度来看，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为主导发展形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承载主体，^②伴随产业发展的新形态、新路径、新模式形成，中国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将迅速提升，并带动产能增长和产品种类扩充。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中国产业发展历程来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长期投资间的期限错配将引发产能过剩问题，^③加之现阶段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国内大市场潜能有待充分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带来新的产能过剩问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针对新兴产业发展作部署时也提出，要“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可见，新质生产

^① 刘友金、周健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2期，第55-73页。

^②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载《改革》2024年第2期，第15-24页。

^③ 朱安东、张宏博：《科学认识当前我国产能过剩》，载《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25-36页。

力培育过程中的产能风险须引起重视。

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化发展能为中国提供充足的海外市场和购买力，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扫清障碍。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基础良好、发展潜力显著。共建“一带一路”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明显高于同期中国贸易整体增速和全球贸易增速。^①其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需求层级提升将扩大对中国新产品的需求。近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援助及投资有效增加了共建国家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其国内民众收入水平，实现了区域贫困削减的目标。^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的收入提升，将带动其需求层级向上攀升，并扩大对除生存必需品外的各类消费品的需求，而提升出口产品种类多元化正是提升产能利用效率的科学对策之一。^③最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促进多边大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中国已成为110多个共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并与20个共建国家签署了14个自贸协定。可以预期，随着“一带一路”不断发展完善，其区域内多边市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亦将逐步提升，进而助力中国和各共建国家更好挖掘区域市场的贸易潜力，^④带动“外循环”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带来更大动能。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 双向赋能的理论框架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理论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在发展周期和目标导向上高度匹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长期性、渐进性特点，前沿技术突破、有效市场规模扩大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则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条

①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② 张原：《中国对“一带一路”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载《财贸经济》2018年第2期，第111-125页。

③ 毛其淋，钟一鸣：《出口多元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3-135页。

④ 孔庆峰、董虹蔚：《“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2期，第158-168页。

件。^①这决定了中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需要在长期内持续激发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市场扩容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样具有长期性、渐进性特点。“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动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实践平台，其基本内涵在于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更加稳定紧密的合作，持续、包容、系统合作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素，^②共建“一带一路”所锚定的“持续合作”正是其长期性、渐进性特征的体现。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以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为导向，^③而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二者均着重强调生产力的现代化、高效化发展，而仅在国别范围上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在促进生产力在新时代下的解放和发展，进而稳步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共建“一带一路”则倡导以合作实现多边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发展，其在周期长度、主要目标、关键意义上均存在契合之处，这说明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共建“一带一路”之间具有实现良性互促、双向赋能的理论可能。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逻辑框架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图1、图2和图3所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逻辑框架。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共建“一带一路”可通过以下三组良性循环关系实现双向赋能。

1. “技术外溢—资源转化”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将带动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化发展，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技术水平提升则可从物料供给和技术共研两方面反馈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共建“一带一路”日渐成熟的多边技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技术互促发展渠道不断增多。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将有所提升，而在此期间所

^① 周文、许凌云：《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载《改革》2024年第3期，第26-37页。

^② 姜安印、刘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征转变、内涵再构与实现路径》，载《亚太经济》2022年第2期，第104-110页。

^③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取得的成果，将通过日益拓展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渠道向共建国家广泛外溢，实现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科技化赋能。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化水平提升，一方面将优化共建国家在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等领域内的精深加工和制造水平，强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链条韧性，为科技创新带来稳定环境；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化水平提升亦将带动共建国家在科研、教育、创新等领域发展，进而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共研能力，对中国技术创新形成反哺，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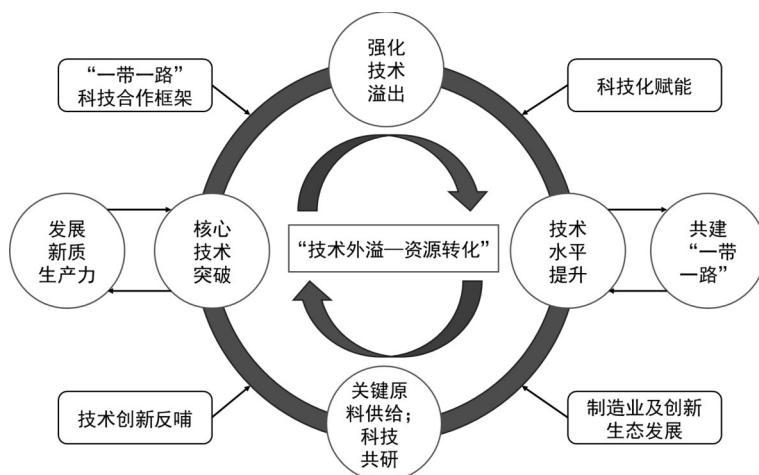


图1：“技术外溢—资源转化”循环逻辑框架图

2. “产业转移—数字化发展”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的数字化转型成效将通过产业转移方式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流动，而共建“一带一路”的数字化发展则将为中国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是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基础，伴随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与各类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融合程度将不断提高，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亦将加快。在此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需求将持续增加，与当前中国核心产业集聚区的土地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为显著。与此同时，部分传统产业或数字化转型相对缓慢的产业则由

于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加速向外转移。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和相对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两方面因素影响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作为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承载，其在吸纳产业资源、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通过学习中资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经验，获得部分由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促进自身数字化发展进程。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加快，亦将从几个方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助力。首先，将推动共建国家形成更高效的生产力，进而带动本国产能优化和优质产品出口增加，使中国产业链条上游供给获得更大的规模和成本优势；其次，将促进共建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并使其具备承接更多产业环节转移、更高效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而促进中国产业转移有序发展，助力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最后，将营造更良好的数字化产业环境，使得中国企业在转移部分产业环节后，仍可通过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进行管理调节，有助于中国企业的跨境运营效率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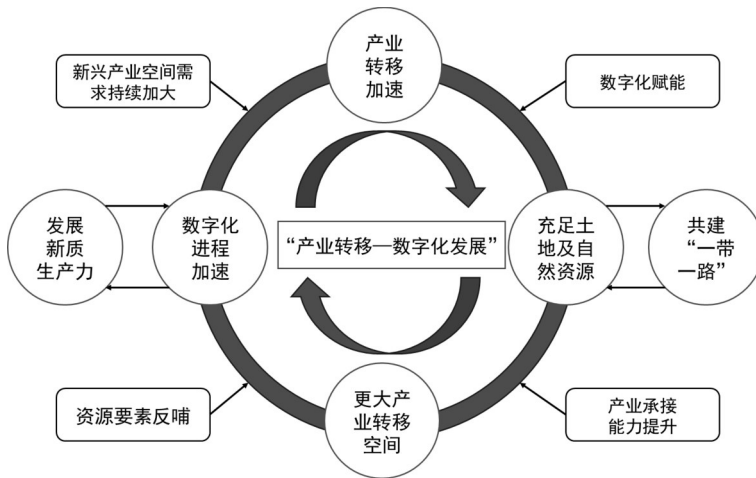


图2：“产业转移—数字化发展”循环逻辑框架图

3. “分工优化—多边市场”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新质生产力发展将以优化生产工具、制造技术出口质量的方式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深入地融入国际分工格局，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分工参与度和地位提升，亦将推动“一带一路”

多边市场提质扩容，消除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产能过剩隐患。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生产工具、产业技术、消费品等方面获得更广泛、更优质的进口供给，并以此提升生产制造的现代化水平，应对自身可能存在的生产能力落后、社会必需品缺乏等问题，实现对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并依托比较优势积极参与至国际分工当中，获得更高的市场利益和国际分工地位。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优化，则将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大市场的扩容提质。一方面，国际分工参与度及地位的提升将有效提升共建国家的社会福祉，并提高其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中国产业进口需求的规模和种类均出现增加；另一方面，由国际分工格局融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将使得“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口依存度上升，进而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市场一体化的意愿水平，最终带动“一带一路”区域市场便利化、自由化程度持续上升，为中国产品“出海”提供更大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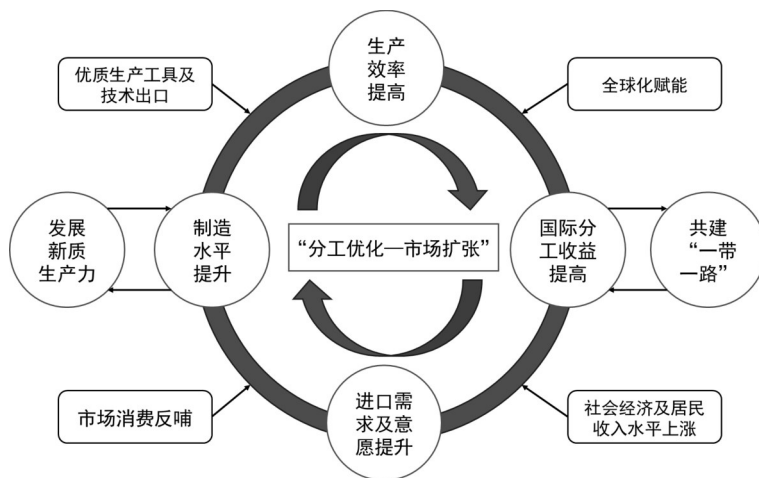


图3：“分工优化—多边市场”循环逻辑框架图

五、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实践进路

当前，全球局势波云诡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叠加而

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都将承受较大的外部风险压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加快构筑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双向赋能的良性互促格局，助力中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一是，提升“一带一路”创新能力，打造科技共研共享生态。科技创新既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①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的关键抓手。^②一方面，中国需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以世界科技前沿为目标、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聚焦芯片技术、精密仪器、工业软件、医疗器械等重大领域进行原创性科研攻关，加快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环节取得技术突破，不断提升前沿产业链条的自主可控性。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中国需深化“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带动区域创新能力发展，携手各共建国家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多边科技合作平台建设，放大前沿技术突破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外溢效应。同时，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促进科技同产业、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引导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等要素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高效配置、加快集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优质科创合作生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科技水平逐步提升。此外，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落地见效，定期开办“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合实验室规模，并积极与各共建国家就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治理展开对话，共促前沿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消弭“一带一路”制度距离，确保双向赋能渠道畅通。良好的体制机制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中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市场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充

① 杨丹辉：《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载《人民论坛》2023年第21期，第31-33页。

② 张慧智、孙茹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载《管理学报》2022年第5期，第1-18页。

分发挥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保障作用。其次，在制度改革创新基础上，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政策交流对接机制，推动国内体制机制与“一带一路”各类合作协议形成良好对接；支持各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亦开展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行动，不断降低制度复杂性对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共建“一带一路”之间双向赋能的负面影响。最后，高标准打造“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并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以高效、自由的制度环境推动“一带一路”开放型经济发展。

三是，织密“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网络，建设现代化产业分工模式。首先，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同时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断增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建设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的基础优势，发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外溢效应。其次，紧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机遇，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各共建国家比较优势，以合作形式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共同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向更高效率、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与各共建国家携手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最后，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会同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为“一带一路”产业分工合作提供更高效、更紧密的交通运输纽带。